

清末江苏“女学救国”思潮的出现与实践

蔺雨婷*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曲阜, 273165

摘要: 19 世纪中叶, 西方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后, 来华传教士逐渐形成以女性教育水平衡量晚清社会文明程度的评判体系。在华传教士据此将晚清社会女性境遇作为实证, 指认中国是半文明国家, 并由此衍生出“兴女学以救国”的改良主张。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晚清士绅接纳并实现这一改良主张的在地化发展, 将其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救国方案。江苏士绅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与清政府合力推进女学建设, 着重塑造女学生的国家意识与新式家庭角色素养, 试图通过培育“新贤妻良母”实现国民再造。这种以国族话语为核心的救国实践, 虽为传统社会转型的有益探索, 却也在客观上造就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消隐。

关键词: 清末; 江苏; 女学救国; 实践

Received: May 17, 2026

Revis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ne 3, 2026

Published: June 8,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Doi: 10.67148/fssh-2026-213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方文明等级论下的女性观传入中国, 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被视为国家衰落之源。囿于救亡图存客观需要, 晚清知识分子接受了在华传教士对“兴女学以救国”的论述, 实现了西方女性观的在地化发展, 并对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寄予了“强国保种”的厚望。在政府与女学创办者规划的救国路径中, 经过新式教育培养的女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新式知识和家庭技能, 不仅能够生育强健的下一代, 而且还能运用新知识从幼时开始培养下一代国民, 这便是新式的“贤妻良母”。为达成这一目标, 江苏政府与士绅通过多种实践重塑女学生的救国角色。

关于江苏女学生的研究, 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 宏观教育史的研究聚焦江苏女子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 对江苏女学生这一教育主体缺乏足够关注^[1-3]。其次, 微观教育史研究江苏女

* 蔺雨婷, 女, 2000 年 4 月生, 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 2025 级博士研究生。

学的发展嬗变，但多局限于单一校史考述，缺乏对女性教育思潮变迁的考察^[4-6]。再次，留学史视角下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清末民初江苏女学生的海外求学经历及其社会活动参与情况^[7-8]。最后，微观群体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多选取特定地域或典型院校的江苏女学生为样本，揭示女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转变过程，但在女学生角色建构和培养上尚存拓展空间^[9-12]。

晚清知识分子与江苏士绅将兴女学纳入救亡图存实践，本质上是西学东渐背景下借助新学救国的重要尝试。本文通过考察西方女性观在华传播与本土化过程，揭示江苏知识精英群体对“兴女学”救亡路径的接纳与发展，并进一步剖析其重塑江苏女学生救国角色的具体实践，从而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女性角色转变的历史认知。

1. 文明之镜：传教士话语下的兴女学与国族重塑

1903年，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出版《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林乐知如是写道：“全书之宗旨，可用两言以蔽之，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13]。林乐知将女子视为国家教化水平的重要标准，若女子不成才，则国家难以有振兴之希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化”、“开化”、“文教兴盛”等词语是英文词civilization的翻译，civilization一词在20世纪后才直接被译为“文明”^[14]。不难窥见，在林乐知的表述中，“女性”被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西方世界中普遍使用。文明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就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意涵，并且进一步被衍生为文明等级论，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基督教传播。在文明等级论的阐释下，象征“文明”的西方国家可以对“非文明”地区随意进行殖民扩张活动，以便协助“非文明”地区建立高级的文明^[15]。随着殖民扩张的进程，西方世界的文明等级论传入世界各地。

19世纪中叶以降，西学东渐的进程随之加快，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因而传入中国。从19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开明的西方知识分子，大多认同以妇女处境与知识水平的优劣，作为评判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与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16]。西方来华传教士来华时，晚清女性深受“缠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愚昧观念的荼毒。在看到晚清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后，深受文明等级论影响的在华传教士，以晚清女性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论证中国是一个未曾完全开化的“半文明国家”。

在华传教士借助女性阐发文明等级论的第一个论点，是女性缠足对国家的危害。在西方传教士看来，缠足既不利于家国利益，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晚清社会文明等级的落后。从家国利益的角度出发，缠足于国于家不利。基督教出版的《教务杂志》认为，缠足的女人只会成为贫穷丈夫的负担，最终陷入家庭贫困的恶循环，进而导致中国的贫穷^[17]。从经济模式上看，缠足破坏了一夫一妻家庭模式背后的生产方式，国计民生困苦不已，“惜乎今时妇女缠足不能操作，致使男人而作女工，以此民用空乏，而国计困穷也”^[18]。从文明等级论来看，缠足也是晚清社会被判定为“半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准。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了《佐治刍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妇女的缠足批为陋习，认为缠足陋习是文教未臻极盛的典例。正如前文所言，文教未臻极盛正是这一阶段 civilization 的反义词^[19]。

在华传教士阐述晚清中国是“半文明国家”的第二个论点，是晚清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被传教士视为晚清社会“国计困苦”的重要原因。1903-1904年，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将“女人的地位和看待女人的方法”上升为判断文明等级的核心标准。而中国之所以沦为“半文明国家”，正是整个社会将女性视作玩物导致的严重后果。不教女性成才“遂使家无贤妻之助，子无贤母之训，其国亦即成为半教化之国矣”^[20]。

妇女既为阻碍文明进程的重要原因，想要提升一国文明程度，自然离不开提升女子教化水平，摆脱加诸于女性身上的陋习。为此，在华传教士也开始了开女智、兴女学的实践活动，冲破了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为部分女性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赛德女士在宁波开办女塾，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女子学校。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女学还有上海俾文女塾^[21]，上海文纪女塾^[22]等。

1860年以前，儒家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未曾遭到太大冲击，在华传教士虽然借助文明等级论对晚清女性观做出一系列评述，但晚清社会依旧保持着传统女性观，对教会女学及其学生认可程度不高，传教士创办女学的活动遭到了重重阻力^[23]。虽然借助传教士的殖民扩张与传播基督教的需求，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得以出现，但此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教会女学中的女学生。

19世纪60年代，为扭转传教困难的局势，西方传教士趁热打铁，借助文明等级论，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继续强调兴女学的重要意义。此时恰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晚清社会故步自封的思想遭到冲击，官僚阶级开始了

自救图新的洋务运动，对西学的认可程度逐步提高。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派发戊戌变法，逐步利用西学挽救民族危亡。趁此机会，西方传教士在过往宣传的基础上，提出兴女学是变法图强的重要因素，“故今日应为之急务，为变法立宪之预备，不能入人人之家而户说之，莫若兴女学，劝女学，使女子而皆有学问，具完全之人格也，将与男子同出而担任人类之义务，则国其庶几乎”^[24]。再次呼吁将女子与女学视为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

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写下的两条宗旨是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的典型代表，即“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为代表的西方女性观表述，实际上是借用女性问题，构建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凸显西方的文明程度，为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提供话语权^[25]，为文明等级高的国家进行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26]。但客观上，也为晚清知识分子重视女性主体地位提供了契机。

从在华传教士将西方女性观传入中国伊始，女性就与国家文明程度相勾连，这十分贴合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儒家思想中本就存在着家国同构的传统女性观^[19]。《女戒》中称“治天下，首重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正夫妇，首重女德”，中国传统女性观认为女性是家国之本，并进一步提出“闺闼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这一传统女性观内在逻辑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在华传教士关于女性才能有益于家国的论述。“尝闻论治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女人为有家者所不可忽视也……有国者又安可忽视女人哉”^[27]，在华传教士认为女性是家国的基石，是强国富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家国同构的重要论点，传教士通过女学不兴则国家无望的观点，逐渐实现了女性境遇与晚清中国的文明程度实现了双向绑定，“兴女学”和“废缠足”一起成为“救亡图存”时代课题下主要答案之一，并逐渐被晚清知识分子接受、阐述和实践。

西方女性观的传入是殖民扩张与现代性交织的产物，既承载文明等级论的霸权逻辑，也催化了中国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华传教士和固有文化的影响下，“兴女学”成为强国之本。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本土化调适，将“兴女学”的相关问题从“文明标准”转化为“救国工具”，为近代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与实践起点。

2. 兴学图存：女学救国思潮的本土化发展与实践

在通过文明等级论将“女性地位”与“国家文明”相绑定的背景下，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弊端，并尝

试将“兴女学”纳入晚清社会变革的议程。郑观应敏锐指出，中国虽人口繁盛、心智开化，却因“女学多疏”导致半数国民才能被压抑。同时，郑观应将儒家理想秩序与近代新式教育诉求结合，重构了女学的社会效用，“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转移间，而道一风同，利兴弊去，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28]。在郑观应的论调中，“兴女学”议题突破道德范畴，升华为近代民族振兴的重要路径。

在晚清救亡思潮激荡下，维新派以“女性才能关联国家富强”的论述为核心，系统论述了兴女学的重要意义。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进一步论述，认为天下积弱之本既始自妇女无才能^[29]。严复与梁启超抱有同样观点，认为当今民族危机与女子未曾开智密切相关，“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30]。维新派的多重论述，不仅重构了女性才能问题的政治属性与救国职能，更以新学话语体系赋予其理论合法性，推动了19世纪末期兴女学思潮从思想启蒙转化为救国实践。

在重视女学的舆论氛围下，一部分晚清官员开始意识到兴女学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上书直言其中利害关系。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时曾说：“中国人民四万万，以男女各半计之，妇女得二万万之数。其在缙绅之族，读书识字者尚不乏人；至若农、工之家，大抵操作有余，灵明未辟，终身不识一字，圣经贤传无由而知。东西洋各国，于女学一事，莫不加意讲求；中国为数千年礼乐之邦，似未可因陋就简”^[31]，既强调中国礼教传统与女学缺失的矛盾，又借西方经验施压清廷改革。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在上书总述北南洋各督抚时，强调兴女学为中国自强之法，“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人自胚胎赋形，即禀母之胎教，自孩提成立依依恃母，饭食、教诲，触处皆关学问。……是欲妇女通知大义，不得不先兴女学明矣”^[32]。经元善在上书中将女学定位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呼应儒家“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

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多重论证，兴女学可救亡图存的论调基本定型。虽论证路径不同，但共同指向“女学关乎国运”的核心命题。尽管清廷尚未正式表态，但此时倡导兴女学的社会基础已大致形成。

在“兴女学以救国”的本土化诉求驱动下，晚清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教会教育的文化依附性，探索具有主体意识的国人自办女学模式。1897年，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决定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学），标志着“兴女学以救国”这一理论正式落地实践。

经元善特邀梁启超起草办学章程，在这篇《创设女学堂启》中，梁启超特以家国同构逻辑构建国人自办女学及培养女学生的合法性。在《创设女学堂启》的开头，梁启超以“戕肢体、黜聪慧、绝学业”总结了传统女性的境遇，直指传统女教通过身体规训与知识剥夺构建的压迫机制，致使占国民半数的女性沦为“闺闼禁锢”的“土番”，国家衰败便成必然宿命。这种将女性解放嵌入国族存亡的论述策略，暴露出维新知识精英对文明等级论的深层焦虑：二万万女性“顽若土番”的境遇，恰印证赫胥黎《天演论》所警示的“弱者先绝”法则。在传统女性观下，“国几何而不弊也？”。而晚清兴女学一事几乎全由教会推动。面对“教会所至，女学接轨”的殖民教育格局，梁启超以“有子弗鞠，乃抑哺于邻室。譬犹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的农耕文明隐喻，揭示教会女学对文化主权的侵蚀，将教育自主性等同于种族存续权。由此观之，经正女学这类国人自办女学对晚清中国意义重大。国人自办女学培养的女学生，可以由小及大、由家及族地全面改善家国境遇：“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32]。梁启超将女性角色从家庭领域拔高至国族竞争层面，这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的女学规划，在“保种强国”的国族叙事中实现了女学生的价值重构。

饱含着救国救民的热情，1898 年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国人自办女学由此发迹，江苏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也由此产生。一部分晚清知识分子，赋予了经正女学的学生以优化种族国家重大期望，“仁而种族，私而孙子，其亦仁人之所乐为有识者也”^[33]。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两年，经正女学就被迫关闭^[34]。经正女学的实践开国人自办女学的先河，实现了国人自办女学从零到一的突破，也形成了女学生群体社会期待的雏形。

在晚清兴女学的热潮中，江苏女学表现尤为突出。江苏位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且思想较为开放，一部分士绅受西学影响较大，较早地开始了兴女学的实践。故而江苏的女子教育发端较早，颇具代表性。1884 年，美以美会传教士在镇江宝盖山创办镇江女塾，这是江苏省内最早的女学堂。1898 年，江苏还建立了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学），为此后江苏乃至全国士绅的兴女学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江苏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将兴女学视为救亡图存的关键机制。江苏知识分子认为，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兴办女学可培育新式国民，进而养成文明教化之邦。“八国之旗飘扬帝阙……于是不得不转思所以救垂亡之策，立新国之基，其道舍教育未由……而又以提倡女学为急务，盖女子必有学识……然后能知为人之义务，尽国民应有之责任，然后能去野蛮之性质，而成文明之治化，尽假而抚育子女，扶植训导之”^[35]。《江苏（东

京)》杂志甚至专开女学论坛、女学文艺等相关专栏,论述女子救国之急切社会责任。“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且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然欲肩斯责任,又岂终日困守香闺、步不出户者所能胜任也?”^[36]。

在清末兴女学以救国的时代浪潮中,江苏士绅率先突破传统桎梏,通过民间力量推动兴女学实践跨越式发展。1907 年以前,清政府并未颁布官方女学章程,但江苏士绅开办的女学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将“兴女学以救国”的理论转化为全省谋篇的战略实践。

在空间分布上,女学堂呈现“三核多节点”格局:南京、苏州、上海为三核心,承担政治文化中心职能;常州、无锡、扬州构成次级枢纽,体现苏南经济带的教育辐射力;吴江、南通等县域节点女学的开办,体现出这一阶段兴女学的教育救国实践已深入江苏基层。这一时期江苏女学办学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女学和女学生数量上,江苏女学数量从 1902 年的 3 所激增至 1907 年的 71 所,增长逾 23 倍;女学生数量更从 1903 年的 22 人跃升至 3395 人,全省(含上海)已有女学堂 71 所,女学生 3395 人^[37]。以无锡振英女塾、常州粹化女学、南京崇文女学、丽泽女子师范学校为代表的江苏女学,吸引了众多女学生来校,规模甚至超过同期多数男校^[38]。至 1907 年,江苏兴女学实践取得了显赫成果,江苏女学总数仅次于直隶,江苏女学生人数则位居全国之冠。开办了务本女学、上海爱国女校、南京汇文女校、南京旅宁第一女学堂、景海女塾、竞化女学、振华女学等享誉国内的女校,江苏女学生群体初步形成。为达成兴女学以救国的目的,这些女学从课程设置、办学宗旨等方面形塑江苏女学生,试图将其形塑为办学者眼中的可以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的理想角色。

表 1 江苏女学数量及女学生人数表^[37]

年份数量	1902 年	1903 年	1904 年	1905 年	1906 年	1907 年
女学	3	5	10	23	56	71
女学生	0	22	60	256	853	3395

3. 国族叙事与母职启蒙：女学思潮对江苏女学生培养的影响

在“兴女学以救国”的思潮影响下，女学生群体承载着救国救民的特殊含义，晚清时人对女学生抱有较大的期待，“教之以家政、授之以科学，凡厥所习皆寻常日用之所必须，而又陶淑其德性，启发其智能，俾获自立于社会，上之可以补国家自强之至计，下可以树社会公益之远图”^[39]。

时人对女学生的期待是基于家国同构的逻辑展开，希冀女学生能够由家及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中的家庭角色塑造环节，则是希望女学生能够成为更贤良、更有才学的新式贤妻良母。梁启超被视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正式提出贤母良妻为女子教育目的者”之始，奠定了女学要培育贤妻良母的基调。同时梁启超还提出女学兴起为外侮所激发，所以强国保种为女学最后之目的^[40]。简言之，实现强国保种的途径为经由女学培育贤妻良母，以便新式女学生在婚后能抚育下一代新国民。

为将女学生培养为新国民之母，江苏士绅在开办女学堂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女学章程，试图培养章程、办学宗旨、课程安排等形式形塑在读的女学生。其教育实践上主要包含两点核心，一是培养女学生的爱国热情，二是将女学生培养为贤妻良母。

为将女学生培养成贤妻良母，江苏士绅在女学课程安排中插入了一定比例的家政类课程。爱国女学的本科分为“文科”、“质科”两部，除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外，在质科中加入家事、手工、裁缝一类科目^[41]。无锡竞志女学认为“女子教育不谋振兴，安足以改良旧家庭”^[42]，故而以“开浚普通智识，潜化家庭习惯”为宗旨，在课程设置中安排家政课、教育原理、保育方法等课程，指明了要将女学生向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43]。

在课程安排之外，务本女学更是直接在校歌中熏陶女学生做好国民之母，以母亲的身份养育未来国民的胚胎。“千寻之木始于苗，百川之水朝宗遥，海上首唱女学校。胚胎国民此其兆，生男勿喜女勿恼，从今民我皆同胞。学界兮光昭，女界兮光昭，宏母教兮兼容并包”^[44]。女学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培养女学生，同时注重培养女学生家务能力，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规划女学救国的路径，即通过女学培育贤妻良母以强国保种。

为了进一步为强国保种的目标服务，江苏士绅大多希冀女学生心怀家国危机，因而在教学中极力培养女学生的爱国思想。一些江苏士绅在开办学校

时直接以“爱国”为宗旨，吸引了一批学生投考。1902年，蔡元培、林少泉等人在上海发起爱国女校，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41]。由于爱国女学的宗旨贴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来学者众多^[45]。1903年，爱国志士杨白民“慨祖国之积弱，嗟阴教之沉沦”，创办上海城东女学生，试图通过培养新式女学生挽救民族危亡，生员日益增多^[46]。

各学校不仅将“爱国”定为宗旨，同时还通过创办主题活动、开设爱国团体等形式培养女学生爱国本能。1902年，吴馨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旨意，以自家家塾为基础，创办务本女塾^[47]。“务本”之名就暗含着女学生救国的潜在意图，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教”^[48]，故名为“务本”。在教学过程中，务本女塾中也不缺乏爱国教员利用节假日开展活动，借此宣传反帝反封建意识^[49]。童同雪、陈婉衍创办宗孟女学，宗孟女学以“增进女子智识体力，使有母仪风范，而能铸造国民”为宗旨，在学校中设立“对俄女子同志会”和“中国红十字社”为爱国活动服务^[50]。

在歌曲中穿插爱国思想也是江苏女学培养女学生爱国本能的重要方式。无锡竞志女学因“新教育不谋普及，何足以竞存于天演界”^[42]而开办，将女学生视为提升国家文明等级的重要手段。竞志女学还通过歌曲的形式强化女学生爱国爱家的认知，“校旗卷风劲，国旗耀日华。文明播种，女学萌芽，新知新理探讨弥涯。讲历史、绘地图，劝君爱国共爱家”^[51]。振华女学在校歌中两次提及女学生需担负对国家的责任，要求女学生改良社会风俗、拯救国难，“璠玕美质琢之成圭璋，师友之益慎勿忘。智圆德方锻炼体魄坚且强，齐家治国身所当……吾侪志气摩穹苍，国难纾兮风俗良，规模永永垂无疆”^[52]。这些女学将女学生的角色定位于“爱国”，启发江苏女学生国族意识的同时，也塑造了女学生国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通过女校对女学生的培养、形塑，逐步改善以往施加于女性的陋习，改善社会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要求女学生废止缠足，并对女学生衣着做出规定。经正女学对直接制定章程阐明女学生缠足问题，“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讲求学问中人，亟宜互相劝改，惟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者，无论已缠足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划定界限，凡缠足者皆不收入学”^[53]。爱国女校规定学生不可缠足，若有缠足者，入学后需逐渐放足^[41]。务本女校鼓励女学生放足，吴若安在务本女塾的回忆录中说到，这一阶段女学放足之风影响社会，每日不少家庭都到务本女塾索要放足鞋样^[49]。在衣着方面，务本女学对学生纪律要求比较严格，禁止学生涂脂抹粉或穿华

丽服饰，规定“帽鞋衣裤，宜朴净雅淡。棉夹衣服用元色，单服用白色或淡蓝。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准携带”^[54]，学生夏季多着白色上衣，冬季多为深色服装。学生多能恪守服饰规范，社会舆论对此多有好评^[49]。上海爱国女塾崇尚质朴，要求学生仪表简洁、形容质朴，在章程中直接写明入学女学生“不得涂抹脂粉；不得著靡丽之衣服及首饰，亦不及诡异之装束及举动以骇众”^[41]。各大女学从女学生入手，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从而逐步改善社会女性陋习。

最后，除重视学识培养外，这一时期的女学还注重培养女学生的良好体魄，以便生育更为优质的下一代国民。20世纪初，知识分子认为，女学生注重体育活动有助于成为国民之母，通过生育良好体魄的后代以改善人种，养成新国民和新民族是女学生的重要责任，“女学的体操尤为重要，女子是国民之母，一国之中，女子体魄强者，则男子体魄亦必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今省重女学堂能知体操之要，而添设之，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岂不美哉”^[55]。为强健女学生体魄，各学校积极在课程中安排体操等课程。常州争存女校为强健女学生体魄，特于暑假期间附设体操传习所，教授建议体操，课程包含普通体操（徒手、哑铃、棍棒、球杆）、游戏体操（唱歌、行进、舞蹈）等^[56]。除此之外，各女学还安排了项目多样的运动会。1905年10月15日下午，务本女塾举行秋季运动会，约五六百人前来观看。务本女塾开展算术竞走、缘绳、跳舞、裁缝竞争等多种项目^[57]。次年的项目在考虑女学生特点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包含美容术、自行车、庭球、竞走等^[58]。1910年无锡竞志女学运动会颇为盛大，入校参观者多达“千六七百人”，还有振华女校、竞化女学等二十余校整队前来参观，包含四五十种项目，全面提升女学生的身体素质^[59]。

社会舆论也对刚刚兴起的女学生群体寄予了多种多样且十分深厚的群体期待。无锡才女吴芝瑛曾在北京与一传教士夫人相谈，传教士夫人言“才知贵国妇人大多不识字者多”。吴芝瑛对此深感惭愧，希望女学生能扭转这一局面，呼吁在校学习的女学生未来要担负起做贤妻良母、改良社会风俗的重任，“愿诸姊妹一雪此言之耻，以自立于竞争之时代。他日为贤妇为贤母，相夫教子各尽其职所当为，人人以破除迷信、改良风俗为己任”^[60]。一些期刊也通过刊载文章提出自己对女学生的要求。1904年，《女子世界》刊载了一首《女学生入学歌》，通过琅琅上口的歌曲，描写了社会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女学生群体形象，并通过舆论传播进一步深化、认同。《女学生入学歌》的首句就肯定了女学生“新国民”的身份，也暗含着女学生婚后要生育、抚养新国民的期待。理想的女学生形象还包括抛弃妆奁伏案向学、锻炼身体、兼修理化、牢记爱国宗旨、学习东西方女英杰、增进文明程度、做救国女英

雄等不同的层面，整个歌曲中“理想的女学生形象”都围绕着国族叙事的核心展开。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脂奩粉盒次第抛，伏案抽丹毫。缙紫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三摩挲。紫裙窈窕芳草香，戏入运动场。……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秋千架设网球张，皓腕次第攘。……展师聊队整衣巾，入学去重行行。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凌须眉。女儿花法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斯巴达魂今来响，活跃地女学堂。励志愿作女英雄，不入学可怜虫^[61]。

尽管社会层面的兴女学风潮轰轰烈烈，但在1907年以前，女学一直未得到官方承认。甚至一些女学堂在开办后遭遇重重阻力，国人自办女学面临着停办、资金缺乏等阻力。1904年，湖南省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反对开办女学堂，以“湘省女学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为借口，上书清朝中央请求封禁女学，清廷遂下发诏令封禁女学^[62]。湖北总督、巡抚并无开办女学之意，遂以“教育青年妇女，易启背逆之端”为由，破坏湖北女学堂，学生不得已退学^[63]。在缺乏官方承认的前提下，女学堂极易因为招致琐事的冲击而停办。一些女学还面临着经济支绌而官方不予维持的窘境。苏州苏苏女校创立三载，“颇受省视学员之推许，而经济支绌，殆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虽屡行吁恳地方大吏拟给补助，莫不以公用匮乏却之”^[64]。女学缺乏官方支持的困境直至1907年才得以解决。

1907年3月，面对庞大的女学数量和女学生群体，清廷官员认为开办女学一事理应由清政府制定章程统一管理。清朝官员认为女学的开办合情合规，“在时政固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社会层面如火如荼的兴女学运动亟须统一管理，“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骛虚名者或不免转滋流弊”^[65]。由此，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即《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承认了女学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女学第一次得到官方承认。

两部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生培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展现了执政当局对女学生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期许。首先，废陋习，禁止女学生缠足。“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其次，要求女学生体悟对国家的责任，“初则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项，指导其实践躬行。渐进则授以对于伦类及国家之责任。”最后，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女子教育的最高机构，其对女学生的期

许更是明显表现出希望女学生成为支撑家庭的贤妻良母。女子师范学堂立学总章义第一条更是直接强调：“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66]。在课程安排上，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女学安排女红课程，以期女学生可以成为合格的贤妻良母，“女红其要旨在使习熟通常衣类之缝法裁法，并学习凡女子所能为之各种手艺，以期裨补家计，兼养成其节约利用好勤勉之常度”^[67]。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部分晚清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女学有利于强国保种，在叙事中对女学生的角色定位以国族叙事为中心。以经正女学为起点，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国人反响不错的国人自办女学，来学者众多，女学生群体初步形成。其中江苏一地兴办女学尤为积极，地方士绅也对女学生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要求。地方士绅兴女学的风潮也带动了清政府女学章程的出台。不管是从社会期许还是执政者的期待来看，20 世纪初江苏女学生的身份定位呈现两个面向，一是被培养为以家庭为核心、生育未来新国民的“贤妻良母”，二是女学生的培养为国族叙事服务。客观上来说，这样的双重设定使得一部分女学生走出闺阁，借女学生的身份阐发爱国主张、动员爱国行动，为带动社会层面的运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江苏兴女学思潮是对救亡图存的时代回应，但受限于时代和阶级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清末民初对“兴女学”等文化观念的接受速度远远超前于传统经济基础的转型进程。这导致晚清“兴女学”的革新缺少相应经济基础的支持，出现经济时段和思想时段的断裂。多数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毕业生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社会生存空间，最终被迫回归家庭接受父权掣肘；其次，国族叙事下的兴女学运动是一场男性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其指导思想延续融合了传教士“兴女学以救国”的观点以及家国同构的传统女性观，将培养出的女学生定位为“强国保种”的资源，却忽视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诉求与发展自主性，造成了部分女性个体自我觉醒和国族叙事的冲突。

4. 结语

晚清民初经济基础的动摇、思想潮流的激荡与民族危机的叠加，使得江苏士绅阶层开始蜕变：外患的挤压迫使他们转向新式学堂、企业的创办，试图以新政维系秩序。这一群体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既延续着传统士绅的保守特质，又因救亡压力而裹挟民族主义色彩。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晚清民初兴女学运动本质是男性精英阶层主导的国民改造工程。新士绅倡导的“贤妻良母”教育,本质是男性精英主导的救亡策略:将女学生塑造具备现代育儿能力的女性,进而培育所谓“新国民”。政府在规训女学生形象时,也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清政府虽确立了女学的合法地位,但其主张与江苏新士绅大致相同,将女学生视为培养新国民的附属品。

民族主义大旗之下,作为被主导者,女学生自我解放的真实诉求悄然消弭。传统社会以“文野”区分华夷的认知体系,在晚清民初遭遇西方文明冲击后发生逆转:知识分子主动接纳西方文明等级秩序,将自身定位于现代文明的边缘。作为民族复兴工程的重要环节,清末民初的江苏女学生被赋予双重使命:既需通过成为“母教载体”培育新国民,又承载着使衰退民族重归世界中心的国族期待。作为被规训者,女学生的培养塑造与国家命运相连,被赋予了很多难以完成的历史使命,成为国族解放的功利性工具。国族话语对个体声音的强势压制,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个体价值与集体诉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导致江苏女学生的自我解放声音在这一过程中被忽视。

参考文献

- [1] 王晓慧. 近代江苏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J]. 徐特立研究(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1(5).
- [2] 徐宁. 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13.
- [3] 张丽华. 清末民初江苏的女子学校教育[D]. 银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4.
- [4] 陈赞绵. 近代苏州女子学校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 2006.
- [5] 王敬文. 近代苏州景海女校的教育事业研究(1902-1952)[D]. 苏州: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18.
- [6] 宋达. 近代苏南私立女学研究[D]. 淮北: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22.
- [7] 陶雅. 清末江苏女子留学生研究(1869-1911)[D]. 合肥: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2019.
- [8] 张晓洁. 近代江苏女留学生群体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2019.
- [9] 黄湘金. 威权的失落与主体的新变——吕惠如与南京女学风潮谏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 [10] 徐宁. 近代上海的女学生(1850—1922)[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4.
- [11] 张素玲. 金陵女子大学的性别文化与女学生身份认同研究[J]. 许昌学院学报, 2008(1).
- [12] 黄永豪. 服饰与上海女学生形象(1907—1922)[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4(1).
- [13]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统考序[J]. 万国公报, 1903(176).

-
- [14] 黄兴涛.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J]. 近代史研究, 2006(6).
- [15] 王锐. “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J]. 人文杂志, 2021(1).
- [16] Coole D H.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119-138.
- [17]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J]. 1893, 24(4): 157-158.
- [18] 抱朴子. 劝诫缠足[N]. 万国公报, 1882-08-14(710): 5-8.
- [19] 宋少鹏.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 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20] 重视教育说[C]//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 教会教育.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418-419.
- [21] 赵乃贤. 中国教育史简明教程[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278.
- [22] 安树芬, 彭诗琅. 中华教育通史: 第6卷[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0: 1127.
- [23] 万琼华.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为个案的考察(1905—1938)[D]. 长沙: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09: 47.
- [24] 林乐知, 范祎. 中国振兴女学之亟[J]. 万国公报, 1905(200): 48-52.
- [25] 殷亚平, 裔昭印. 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第5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186-187.
- [26]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第十集上[M]. 任保罗, 译述. 上海: 广学会, 1903: 13.
- [27]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统考序[J]. 万国公报, 1903(176): 1.
- [28] 郑观应. 论女教[C]//郑观应. 盛世危言.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6-18.
- [29] 梁启超. 论女学(光绪二十二年)[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869.
- [30] 严复.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光绪二十四年 1898)[C]//国闻报汇编: 上卷. 1903: 8-10.
- [31] 刘坤一.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9.14)两江总督刘坤一片[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904.
- [32] 经元善. 又上总署北南洋各督抚宪夹单禀(1898年1月)[C]//虞和平.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经元善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82.
- [33] 梁启超. 创设女学堂启(1897年)[C]//汤志均, 陈祖恩, 汤仁泽. 中国近代史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288-289.
- [34] 褚季能. 第一次自办女学[J]. 东方杂志, 1935, 32(3): 129-131.
- [35] 孙寰镜. 发刊词[J]. 无锡竞志女学杂志, 1910(1): 7-10.
- [36] 何香凝. 敬告我同胞姊妹[J]. 江苏(东京), 1903(4): 144-145.
- [37] 江苏省学堂处所历年比较表、江苏省学生人数历年比较表[C]//王燕来. 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 第2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39-42.
- [38] 胡福明. 江苏省志: 第63辑 社团志妇女团体篇[M]. 南京: 方志出版社, 2000: 49-50.
- [39] 粹化女学募捐启[J]. 女子世界(上海 1904), 1907, 2(6): 8-10.

-
- [40]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2: 393.
- [41] 光绪三十年(1904)秋季爱国女校补订章程[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18-620.
- [42] 竞志女学沿革小史[J]. 无锡竞志女学杂志, 1910(1): 15.
- [43] 无锡竞志女学校第五次改良章程[J]. 无锡竞志女学杂志, 1910(1): 235-244.
- [44] 务本女塾校歌[N]. 神州日报, 1907-06-12(9).
- [45] 蔡元培.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09-610.
- [46] 女学生[C]//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第四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67.
- [47] 吴馨. 务本女学史略[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589-580.
- [48]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C]//雷良波, 陈凤阳, 熊贤军. 中国女子教育史.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3: 248-249.
- [49] 吴若安. 回忆上海务本女塾[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04.
- [50] 专件: 宗孟女学堂章程[J]. 女子世界(上海 1904), 1904(4): 1-3.
- [51] 竞志游艺会歌[J]. 无锡竞志女学杂志, 1910(1): 187-188.
- [52] 校歌[C]//振华女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目录. 苏州: 文新印书馆, 1936.
- [53] 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1897年12月)[C]//虞和平.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经元善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92-195.
- [54] 务本女学校第二次改良规则[J]. 直隶教育杂志, 1905(17): 35-49.
- [55] 记女学体操[J]. 女子世界(上海 1904), 1904(7): 90.
- [56] 争存女校附设体操传习所[N]. 申报, 1908-06-10(11).
- [57] 纪务本女塾及优质舍秋季运动会[N]. 申报, 1905-11-12(9).
- [58] 纪务本女塾运动会[N]. 申报, 1906-05-20(17).
- [59] 纪竞志女学学艺会[N]. 神州日报, 1910-12-19(3).
- [60] 吴芝瑛. 无锡竞志女学校演说[J]. 南洋官报, 1906(63): 45-47.
- [61] 女学生入学歌[J]. 女子世界(上海 1904), 1904(10): 53.
- [62] 湖南女学废闭之原因(1904年10月26日)[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53.
- [63] 湖北裁撤女学[C]//朱有瓚.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52-653.
- [64] 苏苏女学校来函[N]. 神州日报, 1907-06-04(9).
- [65] 学部. 奏定女学堂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907年3月8日[C]//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582-584.

[66]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N]. 时报, 1907-04-02(9).

[67]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N]. 时报, 1907-03-28(6).